

梁家坟会议决定坚守鄂豫陕根据地前后——大局意识和战略决断的典范

□ 高宝新 郜耿豪



红25军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并坚持下来的一块根据地。它以陕南商洛为中心，包括湖北、河南、陕西三省边界地区近20个县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与川陕、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既支持了陕甘，也牵制了进攻川陕的敌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红25军继续长征后，留守根据地的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在形势十分险峻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联系中断的复杂局面下，独立作出了坚守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决策，堪称大局意识和战略决断的典范。

指示信失落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率红25军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会合陕甘边红军，共同发展西北地区的革命力量。会议还决定合并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组成新的特委，领导留下的部队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随后，代理省委书记、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西进途中，以省委名义给留在陕南的省委常委、执委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及中共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发出工作指示信。信中阐述了红25军西征北上的战略任务，指出在当前斗争形势下，“鄂豫陕边区的区域更显示出他在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西北方的发展基础上成为（一）个重要（而）有政治意义的区域”，并对下一步就地坚持和发展鄂豫陕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作出了部署。指示鄂陕和豫陕两特委合并组织一个特委，迅速组织新的红军部队，把现有游击武装组成一个独立团，力争发展成一个师；在游击战争中避免同强大的敌人正面硬拼，要采取突击、急袭、伏击、截击等游击战术，通过小的胜利提高战斗力，从而不断巩固与开创根据地，最大限度地牵制敌人，配合整个西北的革命。省委的指示信，由便衣队交给第3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委托其转交两特委。但在李志英带领游击师特务队寻找特委的途中，特务队长叛变，枪杀李志英和几名战士后，带着省委的信和少数人叛逃，致使省委的指示没有能够传达到两特委。

庆幸的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指示信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我军手中，才由此得知指示信所记载的内容（信件内容可见《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二）》）。

艰难中寻找

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在获悉红25军主力离开陕南进入甘肃境内的消息后，遂于7月17日发布命令，除以部分兵力尾追外，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妄图以“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手段，彻底摧毁根据地。

留在根据地的两特委领导人既不知红25军主力已经离开，也没有获悉鄂豫陕省委对坚守根据地的部署和安排，仍然按照省委原先交给他们的任务，在小范围内开展游击活动。当时，各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部分散在各地，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也是平行关系，整个根据地的斗争失去统一领导。在敌突然的重兵“围剿”下，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各路游击师受到重大损失。一时间，根据地黑云压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险恶。根据地能不能坚守下去？怎样坚守下去？作为留在根据地的最高领导层，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必须尽早作出决断，拿出办法。

在经历了最初各自为战的混乱和迷茫后，两特委开始千方百计查找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动

向，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9月初，鄂陕特委从截获的一份《西京日报》上得知，红25军主力已到甘肃两当、泾川，军政委吴焕先已牺牲。据此，鄂陕特委分析认为，红25军已离开陕南向陕北去了，遂开会研究决定：尽快将各路游击师集中起来，设法跳出敌人包围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集中之后向东寻找豫陕特委，商讨今后行动方针和两特委集中领导以及部队整编等问题。会后，鄂陕特委带领总部战斗营会合第6路游击师和山阳西区游击大队，寻找第3、第4、第5、第7、第9路游击师，并东进寻求与豫陕特委会合。几乎与此同时，豫陕特委也从报刊上获悉了红25军西进北上的消息，并采取了与鄂陕特委相同的举措，将主力第8连编为第1游击大队，连同原来的3个大队，全部集中起来向西寻找鄂陕特委。不久，两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村会合了。在相互交流情况后，两特委初步商定：各自返回原来游击区，布置根据地的工作，收容伤病员，寻找剩余的几路游击师，然后再会合研究下步行动。但很快，意外发生了：两特委在分手后不久，分别在雪窝和富山坪遭到敌人袭击。于是，两特委不得不边打边退，在摆脱敌人后，又重新返回梁家坟会合。

坚守鄂豫陕根据地

再度经受挫折，加剧了部队的混乱情况，部分同志情绪低落，对坚持根据地斗争更加信心不足。尽快统一思想，鼓舞士气，明确下一步行动方针和策略，成为两特委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9月9日，两特委的负责人在商南县梁家坟召开联席会议，鄂陕特委领导人郑位三、陈先瑞，豫陕特委领导人李隆贵、方升普、曾焜等人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分析了形势。鄂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的发言镇定而激昂。他指出，红25军主力已经北上，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多，而敌军正在向我们发动疯狂的进攻，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大的，斗争是艰苦的；然而，陕南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是好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坚决依靠人民群众，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共同奋斗，不但可以生存，而且还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要有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心，一定要带领根据地军民，为保卫鄂豫陕根据地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与会人员对郑位三的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思想认识逐渐得到统一，继续在鄂豫陕边区举起革命红旗、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也坚定了。大家认为，反“围剿”斗争将是十分残酷和困难的，但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也有很多，这里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境内悬崖峻迭，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回旋余地较大，地形有利；地方反动势力弱，三省交界处各方敌人互有矛盾可以利用；鄂豫陕边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还有近

300名红25军老战士作骨干，加之部队有半年多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对我情、敌情、民情、社情有基本了解，只要团结起来，紧紧依靠群众，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一定能够生存和发展的。

根据郑位三的建议，会议就统一根据地党和军队领导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讨论特委书记人选时，陈先瑞主动发言提出：“主力红军走了，我们现在是独立一方的部队，能不能坚持斗争，决定于是否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好的书记领导我们。郑位三同志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组织能力，遇事沉着冷静，深思熟虑，密切联系群众，善于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具体化。鄂豫陕边区开辟根据地以来，他一直担负党政建设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要独立坚持斗争，只有郑位三同志才能担负起特委书记这副重担。”陈先瑞的发言，引起大家的共鸣。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陈先瑞的意见，选举郑位三为鄂豫陕特委书记。这一紧急状况下采取的组织措施，在日后的根据地斗争实践中证明是十分及时和正确的。

会议最终作出以下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陕南特委（后根据中央指示改称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鄂豫陕边革命斗争，新的鄂豫陕特委以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编合各游击武装，组建红74师作为坚守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确定作战方针是游击战，采取同敌人“兜圈子”的方法，灵活机动，扬长避短，不同强敌正面触碰，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击分散、弱小、孤立之敌和地方反动民团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军队内部要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大家死在一块、活在一块。

梁家坟会议是在鄂豫陕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作出的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决策和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是鄂陕、豫陕两特委在与鄂豫陕省委联系中断、没有得到任何指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既符合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又与省委指示信的精神高度契合，展现出成熟的大局意识和高超的战略决断能力。

10月6日，红74师正式成立，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曾焜任政治部主任，部队设两个营、一个手枪团和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共约700人。在鄂豫陕特委领导下，红74师转战于鄂豫陕边的20多个县境，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粉碎了敌人数次围攻，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使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烈火不熄、红旗不倒；同时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红25军、红二方面军等主力红军的长征，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自2022年1月16日《解放军报》）



在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回族乡东高路东侧“万亩大造林”里，坐落着“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碑”。70多年前，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主要领导与国民党傅作义部代表，正是在纪念碑附近的五里桥村张家大院里，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进行了重要谈判。从1948年底至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先后进行了三次，最后一次就是五里桥谈判。经过两天富有成效的谈判，傅作义决定顺应历史潮流放下武器，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从此，解放军彻底叩开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大门。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淮海战役正打得如火如荼。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面分析全国战场形势和敌我实力对比后，决定立即发起平津战役，力求通过“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并举”的方针来解决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最终实现整个华北的解放。总体策略上，我军边打边谈，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逐步开展对傅作义部的政治谈判，力争通过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和天津。12月中旬，徘徊不前的傅作义派代表与我军进行了试探性接触，因其提出了较为苛刻的条件，未展现出和平的诚意，第一次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2月底，人民解放军接连攻克新保安、张家口等重要城镇，解放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只是时间问题。在战局对解放军极为有利的情况下，1949年1月8日、9日，解放军代表分两次与傅作义部代表在天津蓟县进行了第二次谈判。解放军要求和平接管北平和天津，接收傅作义部的军队，并要求傅作义14日前给予答复。此后，傅作义迟迟未予回应，人民解放军遂于1月14日上午10时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人。

天津解放后，北平成了一座孤城，完全处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中，傅作义已经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他派出和谈代表来到位于北平东部的五里桥村，与解放军代表进行第三次谈判，地点就选在村里的张家大院。张家大院由几个四合院组成，每个院子都有走廊、石台台阶，房子是双层方挑檐，青砖灰瓦。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是这里的条件和规格在当时来说都比较好，能够展现出和谈的诚意；二是出于保密考虑，这里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外界发现；三是张家大院距离北平城和位于通县的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都较近，便于双方人员往来。

早在谈判开始前，北平城内的地下党组织就通过多种渠道，秘密接触傅作义部人员，积极做工作，及时掌握傅部的动态。1月15日，谈判正式开始，参加谈判的解放军领导有罗荣桓、聂荣臻等，傅作义方代表有邓宝珊和周北峰等。双方就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指定地点进行改编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问题初步达成协议。1月19日，双方代表根据在五里桥签订的协议，逐条具体化，并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

叩开北平和平解放的大门

五里桥谈判：

□ 郑大壮

条，共22条，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修改后，作为正式协议。21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和傅作义部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分别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22日，傅作义在协议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正式对外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的条文。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五里桥谈判达成基本协议，实现北平和平解放，展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政治攻势和军事斗争巧妙结合的战争艺术和战略智慧，既收编了具有相当实力的傅作义部，又保护了200万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大量的文化古迹，使北平这座历史古城免遭战火，为新中国首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张家大院的一部分分给了农民，一部分用作五里桥小学校舍，还有一部分被生产队征用为办公室和库房。后来大院拆除，1977年在原址上兴建起服装厂。2010年，原址周边被划定为北京地铁6号线车辆段用地，所有建筑均被拆除。随后，在原址东侧修建了“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碑”，用来纪念那段峥嵘岁月。

（摘自2022年2月10日《中国国防报》）



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碑

马晓云：铁血抗日映丹心

□ 袁军宝

在山东省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掩映下，鲁中地区著名抗日英雄马晓云的墓碑安然矗立。看着墓碑上的照片，听着讲解员的讲述，前来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参观者，似乎又回到那个战火纷飞年代，对这位铁血抗日英雄肃然起敬。

马晓云，原名马果果，1906年9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北旺庄（今淄博市经济开发区北郊镇北旺村）。1924年加入东北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晓云回到家乡，发动乡亲支援东北人民抗日，同时筹集枪支，组织联庄会。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

后，在家乡发动组织抗日队伍。同年底，与哥哥马耀南、弟弟马天民参与黑铁山起义，并把筹集到的3支手枪和几百颗子弹全部献给起义部队。1938年4月，马晓云所部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第7支队，马晓云任支队长。7月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第7团团长。

1939年夏，马晓云奉命率领部队插入敌后，开展敌后斗争。他带领战士实施拔掉敌人据点、炸毁日军火药库、破坏铁路使日军军用列车出轨等行动，牵制了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0年初，马晓云被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初回到山东，任清西军分区副司令员。此后，上级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批准成立了清西专员公署，马晓云被任命为专员。

1944年1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指示，清西军分区改为渤海军区第6军分区，马晓云任副司令员。为更有力打击敌人，部队分两路行动。司令员许云轩率一部去小清河以南作战；政委李曼村和马晓云率一部拔除青城县王家庄据点。8月10日，在攻打王家庄据点时，马晓云不幸牺牲，时年

38岁。

马耀南、马晓云、马天民一家三兄弟，都为抗日牺牲。徐向前亲笔题词：“马耀南、马晓云、马天民烈士永垂不朽”。

马晓云的后人马可说：“马家一门三英烈，他们不怕牺牲、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我们也会永远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摘自2019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